

建立民主中国的全民非暴力行动方案

作者：费历鸣

【摘要：本文提出一个分步骤、分层次、国内为主、内外结合的非暴力民主革命方案。中国的民主转型必然是非暴力的突发革命，应该吸取国际和国内民主抗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大力推广国际的和历史上的非暴力行动战略、策略和技巧，并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策略。在越来越严密的高科技监控体系之下，通过风险可控的线上行动和地面行动，通过“同县、同城、同省、跨省”的互通互联的低政治化、低组织化公民行动网络，逐步扩大联络范围和影响力，并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将公民网络组织化、政治化。当导火索事件发生的时候，非暴力民主革命已经获得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民意基础、组织基础和技术基础。】

一、非暴力革命行动的背景与政治社会环境

1.1 虽然十多年来威权主义在全世界有所回潮，但从人类历史大趋势来看，极权、威权和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必然被民主所取代。中国也不例外。威权的回潮只是一股妖风而已（民主转型的理论大家 LarryDiamond 称之为 illWind）。弗兰西斯福山说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终点，丘吉尔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背后不仅有经济、政治、和平、稳定等等方面的原因，更有人性的原因：自由民主是人性的要求。

1.2 中国人有着可歌可泣的争取民主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人为此进行了极为艰辛的抗争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共政权目前是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专制力量，是对全球自由秩序的最大威胁。推动中

国民主也是全球爱好自由和平的人士的共同愿望。

1.3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自由民主观念、法治人权意识都有了显著提高，中国民众与国际社会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可动用的资源和技术越来越多。但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弄得天怒人怨，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习近平、共产党政权的忍耐接近极限，要求政治变革的情绪迅速蔓延。2020 年以来的经济下滑，导致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在迅速提高。

1.4 从民主墙到天安门民主运动，从 1990 年代的组党运动到 2000 年代的维权运动，从 08 宪章到白纸革命，从雨伞革命到反送中运动，中国的民主抗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这既是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精神动力，也是行动者应该借鉴、学习和反思的宝贵财富。

1.5 中共已经建立起严密的高科技极权体系，摄像头、防火墙、大数据、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健康码、DNA 检测、社会信用系统等像一张巨大的网，信息控制和洗脑宣传不断强化，对异议人士、维权者和抗争者的控制和惩罚变本加厉，这对非暴力抗争行动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如何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极权监控之下来启蒙民众、动员和组织非暴力抗议行动，是中国民主革命面临的核心问题。

二、非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技术的传播

2.1 非暴力抵抗（nonviolent resistance）或非暴力行动（nonviolent action），是通过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包括集会游行示威、象征性抗议、公民不服从、经济或政治不合作、行为艺术、线上抗议、秘密出版、抵制或制裁，等等。当民众以非暴力方式，策略性地发起促使专制政府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时，可以称之为非暴力革命。

2.2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暴力被视为革命的唯一方式；但 20 世纪以来的民主化经验表明，非暴力推动了大多数的民主转型，提高了民主革命的成功率，以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的民主更不容易退化或被复辟。

2.3 从民主墙、天安门运动到白纸革命，中国的民主运动呈现的是非暴力形式。中国抗争的非暴力精神受到国际专家、活动家、人权组织的广泛推崇。当前志在推翻中共专制的同仁之中，多数认可非暴力原则。

2.4 近 40 多年的非暴力抗争尚未达到推翻中共专制的目标，但这不能成为非暴力无效的理由。中国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残忍而又精致狡猾（Stein Ringen 在《完美独裁》一书中称中共独裁为“老练的极权主义” *sophisticated totalitarianism*）、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都相当复杂，不应该幻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

2.5 事实上，1989 年的民主运动接近于成功，它也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和平革命提供了激励，让其他独裁者害怕看到血腥镇压的后果。2022 年的白纸革命让我们看到，即使在共产党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技术监控之下，大规模聚集仍有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可以追溯到 1957 年北京大学的 519 运动；即使毛泽东的恐怖极权统治下，也不能说反抗空间彻底不存在）。

2.6 非暴力革命若要取得成效，首先要让人们非暴力产生信心。甘地说：“非暴力是人类被赋予的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这种信心，最主要的是让人们了解和接受非暴力抵抗的理念、了解其成功经验和行动技术。如基恩·夏普一再强调的那样，独裁者并非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强大，而人民也并非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弱小。

2.7 不少人权机构曾经组织过非暴力抗争的培训，但受到直接培训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人数仍非常有限。随着中共对民间的镇压加剧和管控加强，能直接参与这种培训的机会大大缩小，风险

大大增加。

2.8 因此要把海外培训和国内培训结合起来，把线下培训、网络培训和自我培训结合起来。而自我培训则是最基础的环节，海外机构除了邀请国内行动家进行线下培训和线上培训外，应该着重开发、翻译、编辑出版非暴力抗争教材与课程，包括网站、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媒体的内容，并大力推广。

2.9 “培训培训者”。选择一些有推广能力的、意志坚定的骨干进行重点培训，然后由他们继续培训其他培训者，以此类推。在海外受到培训的行动者（如尚未被监控到的海外留学生、雇员或其他任何活动家），可以回国进行地下培训。

2.10 国内潜在的行动者通过翻墙、订阅、社交媒体、电子邮件、“饭醉活动”、人际传播等方式获取培训资料，并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培训。个人化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训练既不违反任何法律、也更容易避开官方的审查和监控。

三、国际经验的中国化与本地化

3.1 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路径不同，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势也不同，每场运动都要依照自己所面临的局面来制定战略和战术。

3.2 需要认真研究、学习全世界已有的非暴力抗争以及民主化经验。除了国内有所了解的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萨哈罗夫、哈维尔，尚有大量案例未受到足够重视。从菲律宾、南斯拉夫到乌克兰、突尼斯，被归称为颜色革命的至少有葡萄牙康乃馨革命、菲律宾黄色革命、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南斯拉夫黑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伊拉克紫色革命、黎巴嫩雪杉革命、白俄罗斯牛仔裤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或柠檬革命、哈萨克斯坦黄色革命、缅甸番红花革命或袈裟革命、摩尔多瓦葡萄革命、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北马其顿多彩革命、伊朗绿色

革命（2009）和头巾革命（2022）等。

3.3 国内外的活动者、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等任何致力于改变中国的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学习非暴力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进行讨论研究与自我教育。对于失败的案例，要分析原因、吸取教训、提早准备，在未来中国的抗争中予以避免；对于成功的案例，需要总结经验、虚心学习，并将其革命战略和行动技术中国化。既要避免照单全抄，更要避免“中国特殊论”，拒绝学习和借鉴历史和别国经验。

3.4 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文章、视频等学习资料，网上已有大量资源。中文资料，如夏普的《非暴力抗争手册》《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CANVAS 的核心教程《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指南》《非暴力抗争战略战术的 50 个要点》、迈克尔·纳伯格的《非暴力手册》等等。可以参见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中国行动（ChinaAction.org）、中国权利在行动（China Rights in Action）、IYP（iyouport.substack.com）、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全球和平教育运动（Global CampaignforPeace Education, GCPE）等等。此外，还有更多的国际机构和网站致力于推广非暴力运动，如国际和平教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PeaceEducation, IPE）、美国和平研究所（TheUnitedStatesInstituteofPeace）、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EinsteinInstitution）、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CANVAS），等等。

3.5 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学、智库和基金会提供与非暴力与民主行动有关的培训、奖学金和访问机会，应该推荐中国行动者（包括志在回国行动的留学生）多多参与学习和交流。

3.6 对现有关于非暴力抗争、和平抵抗策略的各种资料，应该建立一个小组进行搜集、整理；对非中文的资料，应该大力进行翻译；同时，应该发动社会各界尤其是专业人士，制作短视频、纪录

片、歌曲、宣传图片、漫画等等，以各种可能的渠道进行宣传推广。

3.7 中国虽然是单一制专制国家，但各地在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官方控制等方面仍有很大差别。各地维稳力量、维稳方法、民间的空间、抵抗的方式和传统，都有所不同。举凡运动计划的制定、战术的调整、人员的组织动员、行动时机的选择等等，都应该重视和依靠本地行动者的在地判断。

3.8 系统地编辑、总结中国民间已经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1989年之后历次抗争的经验，包括天安门民主运动、民间组党运动、维权运动、环保运动、女权与性少数运动、劳工运动、茉莉花革命、08 宪章、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法轮功反迫害运动、白纸革命、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海外民主运动等。鼓励以电影、纪录片、音乐、短视频、舞台剧、口述史、播客、文章论文等各种形式来呈现这些抗争历史。

四、翻墙：突破信息封锁

4.1 非暴力民主革命要获得成功，规模至关重要。若要吸引更多的参与人数，首先要靠启蒙和鼓动。在中共日益加强信息控制的情况下，如何突破网络防火墙（GFW），将是一个关键因素。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运动之前的思想传播和启蒙，也在于安全的组织与沟通，以及运动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与协调。

4.2 推广 VPN 等翻墙方式。大力开发和传播安全的、廉价或免费的翻墙方法。

4.3 推广数据安全和通信安全的培训。比如推广 Signal、Telegram、加密邮件等通信方式，尽量放弃电话、短信、微信、微博等不安全的联络方式。

4.4 海外民主人士和活动家，应该以各种方式向不能翻墙的人提供信息，尤其是与非暴力运动、公民社会、技术赋权、民主转型有

关的信息。

4.5 游说美国等民主国家制定政策，鼓励翻墙技术的开发，制裁为中共提供审查技术的科技公司，向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以加大其维持防火墙的成本。

4.6 翻墙后，汲取高质量的可靠信息。避免受到虚假信息的污染，提高识别假信息的能力。

4.7 探索和推广那些中共难以控制的通信方式，比如并不通过地面基地站的卫星电话，或未在中国注册的移动电话等。

五、互通互联的行动者：非暴力民主运动的准备

5.1 1980年代开始，中国兴起自由化运动，并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达到一个高潮。六四屠杀之后，自由化运动并未停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人权民主宪政理念，公民社会得以发展；2003年又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这些都是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5.2 习近平上台后，严控媒体和教育，树立个人崇拜，修改宪法，抓捕异议人士，镇压维权运动，加强举国监控体系，摧毁香港自由法治，在西藏和新疆制造极为惨烈的人权灾难。一度相当活跃的维权者和抗争者，很多人被投入监狱，很多人受到严密控制，很多人被迫放弃，这带来了寒蝉效应，人人自危。这使得民间社会和行动者不得不重新探索新形势下的运动战略和战术。

5.3 首先要坚守抗争的理念，维持抗争的势态。不能高调，就低调；不能公开，就秘密；不能政治化，就低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不能实名，就匿名；不能线下，就线上。一些上了黑名单的行动者被管控，但新的行动者会不断涌现。要考虑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要仔细评估风险，既不彻底投降，也不做无畏的牺牲，调整心态，积蓄能量，守望相助，等待时机。

5.4 所谓低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就是暂时地、策略性地放弃或减

缓那些直接对抗的、风险极高的行动、暂时放弃某些高度政治敏感的议题，转而从事政治色彩较低的民间活动，比如读书会、电影欣赏、环保、扶贫、女权、家庭暴力、学校教育、养老保险、儿童权利、动物保护、消费者权利、小区业主维权等等，在点滴的民间活动中，传播人权理念，培养民主意识，积累民主经验，建立信任网络。

5.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入民主抗争的讨论内容，比如数据安全培训，比如阅读讨论非暴力抗争或民主化的著作，比如关注和参与地方选举，比如行为艺术、揭露腐败、给良心犯送饭等等。

5.6 同样道理，在组织化行动网络受到巨大打压的情况下，坚持非组织化或低组织化的行动。比如聚餐、旅游、交友、礼拜、团建、体育活动、线上讨论、网络群组等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 NGO，或把非正式组织正式化，把去中心化的组织中心化。

5.7 “新公民运动”等国内各地抗争群体所实行的、曾在数十个城市蔓延开来的公民同城聚餐，仍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民间活动模式。当大规模公开的聚餐无法组织或风险太高时，可以组织小规模的非公开的聚餐活动，同时视情况来决定是否在聚餐时谈论敏感话题，或决定话题的敏感程度。

5.8 民间活动以本县、本市为基础，联络和发展本地的志同道合者。联络人、聚会地点、聚会时间无需固定，这样可以减少受到监控的机会，而且即使在核心联络人受到限制后，活动仍可继续。

5.9 这些日常的交往是交流思想建立信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维持运动信心、拓展行动网络的重要方式。

5.10 各地的骨干应该有意识地结识、联络附近县市的志同道合者，并进行不定期的线上和线下见面活动。

5.11 以此类推，将“同城圈子”的活动模式不断复制，并有意地将其跨县、跨市和跨省。这种交际网络是互通互联的、自然扩展的、非中心的和符合民主精神的。

5.12 在地理上不必局限于临近省市，在主题上可以花样翻新。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友谊城市公民圈”，比如“武汉-青岛公民联谊活动”，或“辽宁-四川公民年度乒乓球比赛”，或“珠三角登山爱好者”，或“北京记者-律师联谊会”，或“良心犯网络春晚”，等等，这样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种组合。

六、民主革命时机的选择以及革命过程

6.1 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模式，无非是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官方改革、外国干涉、非暴力革命等少数几种。就中国而言，共产党主动改革走向宪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暴力革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军事政变一来无法预期、二来未必走向民主；外国干涉只可能发生在国内民主革命达到巨大规模之后；因此，最可行的、最可预期的、也最有成功希望的，就是非暴力革命。

6.2 非暴力革命往往由突发事件引发，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众情绪达到爆发点，从而形成相当规模的、有一定持续性的集体抗议。

6.3 非暴力革命看似毫无预兆地突然爆发，但任何卓有成效的革命背后，都有长期的社会情绪的积累、长期的思想准备、长期的组织建设、日常抗议的操练和行动的筹划。

6.4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社会管控的加剧、贫富悬殊的扩大，专制腐败导致的社会矛盾与日俱增，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日益蔓延，导致革命的导火索事件（triggerevents）将逐渐增多。它可能是胡耀邦或李克强的逝世，可能是乌鲁木齐的大火，可能是养老金危机或银行破产，可能是四通桥的标语，也可能是一次万圣节或任何一个纪念活动或突发事件。有些情形，使大多数民众（包括公务员、军人、富人等等）成为受害者或感到不满，比如疫情清零政策、计划生育、环境污染、物价飞涨、房地产崩盘、经济崩溃等等。

6.5 中国民众作为行动者，将自发地被某个事件激发，集体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如果旨在推动中国民主的行动者形成某种默契，将迅速加入抗议，使抗议规模迅速扩大。

6.6 附近的行动者和民众在第一时间加入，在官方封锁信息或采取行动之前，抗议迅速蔓延到数个省市。随着人数的增多，仅靠当地的维稳力量无力阻止。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深圳、重庆、成都、天津、武汉、杭州、南京、长沙等）加入抗议，将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6.7 为了不被当局识别身份，可以戴口罩、戴面具，口罩或面具上可以写上个人化的标语口号。在最初几天维持运动的热度，是重要的；否则会被切断与其他抗议的联系，无法蔓延至其他省市。

6.8 “人数有时是至关重要的，但明确的目的和献身精神更为重要。”（Michael Nagler）

6.9 为让当局左右为难，抗议可以利用“两难行动（dilemma action）”的策略，比如打出共产党自己宣传的标语，比如纪念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已故领导人，比如身穿贴有白纸标志的衣服或戴某种颜色的丝巾，比如同时鸣笛，等等。

6.10 如果抗议最初的诉求是经济性、社会性的，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加入政治性的诉求。

6.11 运动的基本形式是集会、游行、示威，同时视情况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等全民不合作运动，以及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比如拒服兵役、不纳税、拒绝服从居家禁令或宵禁、封锁交通要道、占据政府建筑、在标志性建筑或官方建筑上涂鸦、公开焚烧党旗、遮挡或破坏监控设备、利用无人机抛洒传单、号召去银行挤兑、出版禁书禁刊、设立广播电台等等。

6.12 具备条件的时候，宣布成立运动领导组织。运动过程一般会自然涌现领导人物，这类人物有的事先不在官方的监控名单里，因此官方难以提前控制；有的在运动前的长时间里已经积累了足够

的人脉和声望，因此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有的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

6.13 领导组织要有备选梯队，确保在核心层被逮捕或因其他原因退出的情况下，组织仍可以保持运作。领导组织的出现，与运动的多中心化结构并不矛盾。任何领导者被捕，都不导致整个运动的瘫痪。

6.14 如果运动中出现一个以上的领导组织，应该尽可能协调、沟通、分工合作，尽最大努力避免内讧。

6.15 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但是暴力机器的维持，要依赖社会各部门及人民的服从与合作。运动发起之后，要尽力游说在军队、公安等一切官方机构工作的亲友，劝他们不要为专制卖命，不要用暴力对待人民。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各界包括体制内的支持，比如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明星、记者、企业家、公务员、工人等。

6.16 当运动达到一定规模，镇压将变得非常困难；这又会进一步扩大运动的规模。当镇压的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道义成本）急剧提高，体制内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就急剧扩大，高层的改革派将有机会获得话语权乃至主导权。与此同时，军队内部发生抗命或哗变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民变促政变”“以民变促兵变”。

6.17 和平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将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的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媒体、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中共当局将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在革命爆发之前，行动者就应该与西方政府、国际人权组织、主流媒体和国际知名人物保持联系、建立信任，以便得到他们的及时声援。

6.18 因此，民众的非暴力抗争是转型的基础。没有民众的和平革命，也难以催生高层的改弦易辙、军事哗变以及国际介入。

6.19 和平革命如果进展顺利并具备与当局抗衡的实力，应该视时机决定占领主要媒体、发布告全民书、敦促官方进行谈判等。

6.20 提前制定预案，在官方宣布妥协或开始镇压、切断网络、宣布戒严等不同情况下，采取理性的应对措施。运动组织者可以宣布阶段性胜利、可以升级抗议手段、可以转变运动策略，但都不应背离非暴力原则。

6.21 如果民主运动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和理性的策略选择，将极大地降低共产党当局决定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和 1989 年的情况不同，当局一旦开始武力镇压，高层分裂和军队抗命将是大概率事件，美国等民主国家极有可能进行干涉。运动整体的非暴力性质将极大地促进高层的分化和赢得全世界的支持。

6.22 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运动失败的时候，不气不馁，继续积攒下一次运动的力量。即使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也可以发现骨干、历练队伍、积累经验等等。我们只需要赢一次，共产党就输了。道义和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七、中国非暴力民主革命的其它问题

7.1 海外的活动者和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海外人士和机构，应该全力配合和支持国内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海外人士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如提供资金和人道援助，救助政治犯，游说民主政府，接受媒体采访，发布和传播信息，为国内行动者提供联络平台，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组织沙龙，编辑出版禁书，启蒙和培养行动骨干，曝光中共贪官和人权恶棍的个人信息和海外财产，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等等。

7.2 海外的活动者应利用自由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来积累自己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帮助国内转发信息，让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了解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内行动者需要的时候，提供建议、咨询或参与策划。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回国参与民主运动。

7.3 西藏、新疆、香港、内蒙古问题：这些地方的历史、社会、

民族、宗教问题相当复杂，中共的野蛮统治更促使他们要求独立，尤其是新疆和西藏。中国民主人士应该大力支持他们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努力，理解他们要求自决权的渴望，和他们一道反抗中共暴政。用非暴力革命来摧毁中共专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实现民主宪政之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民主人士要反思大一统观念、放弃汉族沙文主义，要以最大的诚意请他们理解推翻中共专制的优先性。在历史积怨很深的情况下，加强民间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建立沟通渠道，在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7.4 一旦抗议者被逮捕，民间社会要照顾其家属（尤其是老年的父母、未成年的子女和其他需要照顾的患病或残障家属等），以免其后顾之忧。

7.5 对于非暴力行动中出现的暴力，组织者、领导者和运动的参与者要及时予以制止和谴责。有时候，这种暴力举动来自官方的“掺沙子”，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及时调查真相、予以揭露。

7.6 运动的组织者要有责任伦理的意识，不能因自己的冲动而使参加者陷入巨大的风险或承担不成比例的代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人在参与行动前都会做风险评估，因此，既不应该过分地低估行动的风险而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也不应该夸大行动的风险而使人们畏缩不前。

7.7 关于人数。政治学家 EricaChenoweth 和 MariaJ. Stephan 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只要超过人口 3.5%的民众积极参与抗争，便有望令政府退让甚至瓦解，促成变革。中国人口的 3.5%大约是 4900 万，

看起来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数字。但实际上，一、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未必需要 4900 万抗议者就可能实现目标；二、中国人对当局不满的比例远远超过 3.5%，而且只增不降，这些人从不满到行动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三、当运动人数不断增加、持续时间不断延长，加入运动的人很可能呈几何级数增加。

7.8 至于运动后期和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圆桌谈判、权力移交、宪

法起草、民族问题、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转型正义等等，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但仍需未雨绸缪，认真对待，广泛讨论，在结合中国国情和各方实力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

八、结语

本方案只是一个大致的思路，很多细节、预案和策略需要志同道合者贡献智慧、逐步完善，很多决定要在民主运动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形临时做出，也有很多计划细节和策略不宜公开讨论。本方案提供的思路，在前期准备阶段强调公开化、去中心化、低政治化、低组织化、尊重每个人的风险评估、注重运动的可持续性，因此即使中共当局掌握这些内容，也无法阻止运动的准备。在运动爆发之后，强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多中心化与组织化相结合、国内国际相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此运动不会被中共当局轻易摧毁。

在中国推翻专制、建立民主是一项极为光荣、也极为艰巨复杂的任务。修昔底德有句名言“幸福来自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但自由更需要智慧、耐心的准备以及周密的计划。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推翻残暴的中共专制政权，也许五年之内，也许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内，但不会更久。